

●曹 之

鲁迅与古籍版本学

ABSTRACT Lu Xun (1881 ~ 1936), being a great writer, thinker, revolutionary and a bibliotist of ancient books as well, had made a profound study of the edition source and edition appraisal of ancient books. 37 refs.

SUBJECT TERMS Lu Xun (1881 ~ 1936)—Studies Bibliotists—China—Modern times

CLASS NUMBER G256.2

1926年,鲁迅先生曾请魏建功代校《太平广记》中的若干传奇小说。该年7月4日在致魏建功的信中写道:“我的底子是小版本,怕多错字,现在想用北大所藏的明刻大字本来校正它。”^[1]这里“小版本”指清代黄晟刻本,“明刻大字本”指明代长洲许自昌刻本。在《鲁迅全集》里,诸如此类关于古籍版本的记载比比皆是。鲁迅先生不但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、思想家和文学家,也是一位出类拔萃的古籍版本学家。

1 鲁迅对版本源流的研究

版本源流是古籍版本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。它有广狭二义:广义的是指古籍制作方式的演变源流,其中包括历代刻书情况等;狭义的是指一书版本在流传过程中的演变源流。

对于历代各种版本源流,鲁迅先生了如指掌,他多次谈到明刻本、清刻本、民国刻本、石印本、插图本、抄本、选本、善本、珍本、丛书

本、坊刻本等。明代是我国雕版印刷的黄金时代,刻本之多,是其他朝代无法比拟的。但是明刻本的质量却是良莠不齐,不少刻本甚至胡乱删改、变易书名。对此,鲁迅先生曾多次提出过严厉的批评,他在《准风月谈·四库全书珍本》中说:“明末人好名,刻古书也是一种风气。然而往往自己看不懂,以为错字,随手乱改。不改尚可,一改,可就反而改错了,所以使后来的考据家为之摇头叹气,说是‘明人好刻古书而古书亡’”。^[2]在《古籍序跋集·〈寰宇贞石图〉整理后记》中说:“明代书估刻丛,每好变幻其目,以眩买者。”^[3]清代刻本,尤其是文网严密的康、雍、乾三朝刻本,出于政治需要,也是大量删改古籍。鲁迅先生在《且介亭杂文·病后杂谈之余》中说:“新近出版的《四部丛刊续编》,自然应该说是一部新的古董书,但其中却保存着满清暗杀中国著作的案卷,例如宋洪迈的《容斋随笔》至《五笔》是影宋刊本和明活字本,据张元济跋,其中有三条就为清代刻本中所没有。”^[4]三条之一题为

《北狄俘虏之苦》，记载了金人对于北宋俘虏的虐待，“清朝不惟自掩其凶残，还要替金人掩饰他们的凶残”。^[5]对于民国版本，鲁迅先生最为熟悉，谈得也最多。刘承干（1882～1963年）是位著名藏书家和出版家，先后刻有《嘉业堂丛书》、《吴兴丛书》、《留余草堂丛书》、《求恕斋丛书》等，鲁迅先生在读过刘刻《安龙逸史》后说：“对于这种刻书家，我是很感激的，因为他传授给我许多知识……每种书的末尾，都有嘉业堂主人刘承干先生的跋文，他对于明季的遗老很有同情，对于清初的文祸也颇不满。”^[6]罗振玉（1866～1940年）也是著名的学者和出版家，清末刻有《玉简斋丛书》、《衰翰楼丛书》等，民国时影印有《永慕园丛书》、《嘉草轩丛书》等。鲁迅先生说：“罗遗老出书不少，如明器、印玺之类，俱有图录，惜价贵而无说，亦一憾事。”^[7]石印是清末由西方传入的一种先进印刷技术，不少书坊捷足先登，利用石印大发其财，印了不少质量低劣的丛书，鲁迅先生斥之曰“胡闹”，并以《唐人说荟》加以说明：“《唐人说荟》也称为《唐代丛书》，早有小木板，现在却有了石印本了。然而反加添了许多脱落、误句、破句。全书分十六集，每集的书目都很光怪陆离，但是很荒谬，大约是书坊欺人的手段罢。”接着，鲁迅先生列举了石印本《唐人说荟》“胡闹”的种种表现：“一是删节”，即胡乱删节内容；“二是硬派”，即把一篇文章当成一种书；“三是乱分”，即把一种书分成几种书；“四是乱改句子”即把不易读懂的俗语随便修改；“五是乱题撰人”，即把著者弄错；“六是妄造书名，而且乱题撰人”，即无中生有，胡编书名和著者；“七是错了时代”，即把宋人当作唐人。^[8]没有对《唐人说荟》石印本的认真研究，鲁迅先生就不可能揭露得如此淋漓尽致。鲁迅先生对于版画有特殊的兴趣，1933年12月，他与郑振铎合编《北平笺谱》，自费印行。他在《集外集拾遗·北平笺谱序》中考证了版画的源流：“镂像于本，印之素纸以行远，而及众，盖实始

于中国，法人伯希和氏从敦煌千佛洞所得佛像印本，论者为当刊于五代之末，而宋初施以彩色，其先于日耳曼最初木刻者，尚几四百年。宋人刻本，则由今所见医书佛典，时有图形，或以辨物，或以起信，图史之体具矣。降至明代，为用愈宏，小说传奇，每作出相，或拙于画沙，或细于擘发，亦有画谱，累次套印，文彩绚烂，夺人目睛，是为木刻之盛世。清尚朴学，兼斥纷华，而此道于是凌替。光绪初，吴友如据点石斋，为小说作绣像，以西法印行，全像之书，颇复腾踊。然绣梓遂愈少，仅在新年花纸与日用信笺中，保其残喘而已。”^[9]他还在《且介亭杂文·〈木刻纪程〉小引》中说：“中国木刻图画，从唐到明，曾经有过很体面的历史。”^[10]

一书版本源流的考证方法，通常分为三个步骤：一是查考结集原貌，二是网罗同书异本，三是梳析源流。鲁迅先生考证《嵇康集》版本源流时正是这样做的。他根据《隋书·经籍志》的著录，认定“康集最初盖十五卷，录一卷”。^[11]接着，他通过查考《旧唐书·经籍志》、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、《宋史·艺文志》、《崇文书目》、郑樵《通志·艺文略》、晁公武《郡斋读书志》、尤袤《遂初堂书目》、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題》、马端临《文献通考》、杨士奇《文渊阁书目》、叶盛《绿竹堂书目》、焦竑《国史·经籍志》、钱谦益《绉云楼书目》、钱曾《述古堂书目》、纪昀等《四库全书总目》、永瑤等《四库全书简明目录》、朱学勤《结一庐书目》、洪颐煊《读书丛录》、钱泰吉《曝书杂记》、莫友芝《邵亭知见传本书目》、江标《丰顺丁氏持静斋书目》、缪荃孙《清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》、陆心源《皕宋楼藏书志》、祁承燾《澹生堂藏书目》、孙星衍《平津馆鉴藏书籍记》、赵琦美《脉望馆书目》、高儒《百川书志》等28种书目，弄清了《嵇康集》的同书异本及其流传源流。他在《古籍序跋集·〈嵇康集〉序》中说：“魏中散大夫《嵇康集》在梁有十五卷、《录》一卷。至隋佚两卷。唐世复出，而失其《录》。宋以来，乃

仅有十卷……至于槧刻，宋元者未尝闻，明则有嘉靖乙酉黄省曾本，汪士贤《二十一名家集》本，皆十卷。在张溥《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》中者，合为一卷，张燮所刻者改为六卷，盖皆从黄本出，而略正其误，并增逸文。张燮本更变乱次第，弥失其旧。惟程荣刻十卷本，较多异文，所据似别一本，然大略仍与他本不甚远。清诸家藏书簿所记，又有明吴宽丛书堂抄本，谓源出宋槧，又经鲍庵手校，故虽迻录，校文者亦为珍秘。予幸其书今在京师图书馆，乃亟写得之，更取黄本讎对，知二本根源实同，而互有讹夺。惟此所阙失，得由彼书补正，兼具二长，乃成较胜。”^[12]《嵇康集》以明黄省曾刻本和丛书堂抄本为优。鲁迅先生在整理《嵇康集》时，以丛书堂抄本为工作本，校以黄省曾刻本。两本文字互有异同，择善而从。鲁迅先生在考订《嵇康集》版本源流的过程中，有两个特点值得注意：第一，鲁迅善于利用古籍书目考订版本源流。古籍书目反映了一时、一地、一人的藏书情况，是历代古籍的清单，是读书治学的钥匙。为了考证《嵇康集》的源流，鲁迅先生查阅了28种古籍书目。可见他对书目的重视。不仅如此，鲁迅先生毕生都很注意收藏、利用古籍书目。根据《鲁迅日记》记载，1913年3月26日，他购买了黄友芝的《邵亭知见传本书目》；1913年12月22日，他购买了晁公武《郡斋读书志》。1926年7月，鲁迅先生为唐张鹭《游仙窟》作序时，致函章廷谦，托他在北大图书馆借杨守敬《日本访书志》和日本人森立之的《经籍访古志》。^[13]1927年7月16日，鲁迅先生在广州知用中学讲话时说：“我以为倘要弄旧的呢，倒不如姑且靠着张之洞的《书目答问》去摸门径去。”^[14]可见鲁迅先生把《书目答问》当作“弄旧”的“门径”，这的确是他的经验之谈。第二，鲁迅先生善于利用校勘的方法考证版本源流。版本学与校勘学是一家之学，要从内容上鉴定版本，离开校勘，不克成功。为了弄清诸本优劣，鲁迅先生将《嵇康集》各本反复比较，发现明清

各本（丛书堂本除外）皆从黄省曾本出。丛书堂本和黄省曾本虽然皆出宋本，但内容文字亦有不同，如第一卷黄本佚三首五言诗；第四卷《黄门郎向子期养生论》，丛书堂本“康答文在内，（黄）刻本析为两篇，别题曰《答难养生论》”。^[15]为了校勘异同，鲁迅先生付出了艰巨的劳动。

我国古籍多为雕版，版片雕好之后，只要版片完好无缺，就可以一直刷印下去。版片传世既久，可能为刻版者世代珍藏，也可能数易其主。藏版者可能是刻版者，也可能是“二传”、“三传”等，不能简单地把藏版者同刻收者划上等号。考订版片流传源流也是版本学研究内容之一。清光绪间，会稽章寿康刻《式训堂丛书》初集、二集、三集，后来版片流入吴人朱记荣校经山房，朱氏先以数种附入《槐庐丛书》，又合二、三集版片辑印为《校经山房丛书》，朱氏在序跋中未就版片源流作任何说明，不知底细的人，遂误以为《槐庐丛书》和《校经山房丛书》为朱氏原刻。但是，鲁迅先生明察一切，他在1912年9月8日的日记中写道：“翻《式训堂丛书》，此书为会稽章氏所刻，而其版今归吴人朱记荣，此本（指当日从北京琉璃厂购回的《式训堂丛书》）即朱所重印，且取数种入其《槐庐丛书》，近复移易次第，称《校经山房丛书》，而章氏之名以没。”^[16]

2 鲁迅对版本鉴定的研究

版本鉴定是古籍版本学研究的另一个重要内容。通过鉴定，弄清版本朝代及真伪优劣，为读书治学和科学研究提供一个精良的善本。

版本鉴定无非内容、形式两途。内容与形式相比，内容更为重要，譬如了解一个人，不仅要知道他的外貌衣着、高矮胖瘦，更重要的是要知道他的脾气性格、兴趣爱好等内在特征，如果单纯以衣貌取人，就会犯极大的错误。鲁迅先生鉴定古籍版本总是把内容放在首位，不以讳字，字体等外在特征作为主要依

据。例如原京师图书馆藏有《易林注》残本,缪荃孙据讳字、纸质、墨色、字体、装订等外在形式定为宋本,鲁迅先生则根据内容定为元本或元代以后刻本。他说:“细看内容,却引用阴时夫的《韵府群玉》,而阴时夫则是道道地地的元人”,^[17]宋代刻本怎么能够引用元代人的话呢?有的人甚至孤立地把讳字当作鉴定版本的唯一标准,鲁迅先生为此发表了很好的意见:“前朝的缺笔字,因为故意或习惯,也可以沿至后一朝。例如我们民国已至十五年了,而遗老们所刻的书,仪字还‘敬缺末笔’。非遗老们所刻的书,宁字玄字也常常缺笔,或者以元代玄,这都是民国而讳清讳,不足为清朝刻本的证据。”^[18]鉴定古籍版本的朝代要进行全方位考察,不应孤立地抓住某一方面就匆忙作结论。鲁迅先生指出:“故于旧书,不以缺笔定时代,如遗老还有将仪字缺末笔者,但现在确是中华民国;也不专以地名定时代,如我生于绍兴,然而并非南宋人,因为许多地名是不随朝代而改的;也不仅据文章的华朴巧拙定时代,因为作者是文人还是市人,于作品是大有分别的。”^[19]鲁迅先生鉴别选本、坊刻本、《四库全书》写本等的优劣,也是从内容入手的。选本即节选诗文总(别)集而编定的本子。鲁迅指出:“至于选本,我倒以为是弊多利少的……倘要研究文学或某一作家,所谓‘知人论世’,那么,足以应用的选本就很难得。选本所显示的,往往并非作者的特色,倒是选者的眼光。眼光愈锐利,见识愈深广,选本固然愈准确,但可惜的是大抵眼光如豆,抹杀了作者真相的属多,这才是一个‘文人浩劫’。”^[20]例如萧统《文选》,“没有嵇康《家诫》,使读者只觉得他是一个愤世嫉俗,好像无端活得不快活的怪人;不收陶潜的《闲情赋》,掩去了他也是既取民间《子夜歌》意,而又拒以圣道的迂士。选本既经选者所滤过,就总只能吃他所给与的糟和羹,况且有时还加以批评,提醒了他之以为然,而默杀了他之以为不然处。”^[21]坊刻本指以营利为目的

书坊所刻之书,书坊刻书旨在速售牟利,图书内容有不少问题。鲁迅说:“书坊店是靠不住的,他们像估衣铺一样,什么衣服行时就挂什么。”^[22]“从明末到清初,就时有欺人的丛书出现,那方法之一是删削内容,轻减刻费,而目录却有一大串,使购买者只觉其种类之多;之二,是不用原题,别立名目,甚至另题撰人,使购买者只觉其收罗之广,如《格致丛书》、《五朝小说》、《唐人说荟》等,就都是的。现在是大抵消失了,只有末一种化名为《唐代丛书》,有时还在流毒。”^[23]鲁迅说:“书坊专为牟利是不好的,这能使中国没有好书。”^[24]《四库全书》是古代最大的一部丛书,以写本的形式转世。从形式上看,堂而皇之,馆阁字体,彩娟封皮,但是内容如何呢?鲁迅先生指出:“单是雍正、乾隆两朝的对于中国人著作的手段,就足够令人惊心动魄。全毁、抽毁、删去之类也且不说,最阴险的是删改了古书的内容。乾隆朝的纂修《四库全书》是许多人颂为了一代之盛业的,但他们却不但捣乱了古书的格式,还修改了古人的文章。不但藏之内廷,还颁之文风较盛之处,使天下士子阅读,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,也曾经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。”^[25]《四库全书》“于汉人的著作,无不加以取舍,所取的书,凡是涉及金元之处者,又大抵加以修改,作为定本。此外,对于‘七经’、‘二十四史’、《通鉴》,文士的诗文,和尚的语录,也都不肯放过,不是鉴定,便是评选,文苑中实在没有不被蹂躏的处所了”,^[26]可见鲁迅先生力斥写本《四库全书》之谬。1933年6月,当国民党政府下令影印文渊阁写本《四库全书》未刊本时,鲁迅先生专门写过《四库全书珍本》一文,表示坚决反对。他说:“这回的《四库全书》中的‘珍本’是影印的,决无改错的弊病,然而那原本就有无意的错字,有故意的删改,并且因为新本的流布,更能使善本湮没下去,将来的认真的读者如果偶而得到这样的本子,恐怕总免不了要有搔头叹气的第二回。”^[28]

鲁迅先生在古籍鉴定时,重视内容,但并不完全排斥形式。他对各种版本的材料、版式、纸张、装订、插图等外观形式都有深入的研究。1934年1月17日上海《申报》一则有正书局关于《芥子园画谱》三集的征订广告云:“本局费二十年心力经营木刻,不惜工本,将三集依式刊印,彩色鲜艳活泼,与宋元真迹无异,且多超过原本之处,诚为美术之绝品。”鲁迅先生鉴定之后,发现并非全是木刻,他在刻本题记中说:“其广告谓研究木刻十余年,始雕是书,实则兼用木版、石版、波黎版及人工著色,乃日本成法,非尽木刻耳,广告夸耳!”^[29]可见鲁迅先生对于各种版片都很熟悉,甚至一望而知。版式是指一书的天头、地脚、栏线等,鲁迅先生喜欢那种前有扉页,天头、地脚都很宽大的书。他说:“较好的中国书和西洋书,每本前后总有一两张空白的副页,上下的天地头也很宽。而近来中国的排印的新书则大抵没有副页,天地头又都很短,想要写上一点意见或别的什么,也无地可容,翻开书来,满本是密密层层的黑字,加以油臭扑鼻,使人发生一种压迫和窘促之感,不特很少‘读书之乐’,且觉得仿佛人生已没有‘余裕’,‘不留余地’了。”^[30]纸张对于印刷效果,图书寿命关系极大。印行《北平笺谱》时,他对郑振铎说:“用纸,我以为不如用宣纸,虽不及夹贡之漂亮,而较耐久,性亦柔软,适于订成较厚的书。”^[31]可见鲁迅先生对纸张性能非常熟悉。装订对于读者阅读、图书流布关系极大,还是在印行《北平笺谱》时,他对郑振铎说:“蝴蝶装虽美观,但这牢,翻阅几回,背即凹进,化为不美观,况且价贵,我以为全部作此装,是不值得的。”^[32]可见鲁迅先生对图书装订也很内行。鲁迅先生生前对于藏书的装订形式特别讲究,他经常自己动手重装古籍,这在《鲁迅日记》中屡有记载。古籍插图有绣像、全相两种形式:所谓“绣像”,指书前冠有人物的画像,一般为单线勾勒,模写精细,不画背景;所谓“全相”,指正文中插有反映故事情节

的画面。鲁迅说:“欢迎插图是一向如此的,记得十九世纪末,绘图的《聊斋志异》出版,许多人都买来看,非常高兴的。而且有些孩子还因为图画,才去看文章,所以我以为插图不但有趣,且亦有益。不过,出版家因为成本贵,不大赞成,所以近来很少插图本。”^[33]还说:“书籍的插图,原意是在装饰书籍,增加读者的兴趣的,但那力量,能补助文字之所不及,所以也是一种宣传画。”^[34]鲁迅在很多场合总是为插图本摇旗呐喊,为这种艺术形式奔走呼号。

3 藏书、出版和古籍整理实践使鲁迅成为古籍版本学家

鲁迅先生对古籍版本学造诣极深。鲁迅先生所以能够如此,是因为:第一,鲁迅先生是位藏书家。据《鲁迅日记》书帐记载,他每年购书少则50余种,一般都在200种左右,1936年购书多至367种,平均每天购书1种。他每月都要从微薄的收入中拿出数十元购书。他在1912年的书帐后写道:“京师视古籍为古董,惟大力者能致之耳。今人处世不必读书,而我辈复无购书之力,尚复月掷二十余金,收拾破书数册以自怡悦,亦可笑叹人也。”^[35]当然,购书中有一个选择版本的问题,孰善孰恶,必须心中有数。在长期的访书实践中,久而久之,古籍版本学也就无师自通。第二,鲁迅先生是位出版家。他一生办过7个出版社:未名社、朝华社、三闲书屋、野草书屋、铁木艺术社、版画丛刊会和诸夏怀霜社。为了办好出版社,鲁迅认真研究古籍的版式、纸张、装订等,古为今用。第三,鲁迅先生又是位著名学者。鲁迅一生著作等身,有数百万字之多,其中古籍整理方面的著作有:1909年6月至1911年12月辑录古小说佚文,编成《古小说钩沉》;1913年辑录谢承《后汉书》、谢沈《后汉书》和虞预《晋书》;1913年5月到1914年3月辑录《云谷杂记》;1913年至1924年校订《嵇康集》;1914年8月辑录《志林》、《广林》、《范子计然》、《任子》、《魏子》

和《会稽郡故事杂集》;1916年辑录《唐宋传奇集》;1926年辑录《小说旧闻钞》等。整理古籍必须研究版本,没有古籍版本学的深厚功底,是难以胜任的。例如,鲁迅在编《唐宋传奇集》时,使用的古籍及其版本就有:明刊本《文苑英华》;清黄晟刊本《太平广记》,校以明许自昌刻本;涵芬楼影印宋本《资治通鉴考异》;董康刻士礼居本《青琐高议》,校以明张梦锡刊本及旧钞本;明翻宋本《百川学海》;明钞本原本《说郭》;明顾元庆刊本《文房小说》;清胡珽排印本《琳琅秘室丛书》等。^[36]他非常讲究版本,但是由于条件所限,大多用的是通行本,不象胡适、郑振铎等多用孤本。他说:“郑君(指郑振铎)治学,盖用胡适之法,往往持孤本秘籍,为惊人之具,此实足以炫耀人目,其为学子所珍贵;宜也。我法稍不同,凡所泛览,皆通行之本,易得之书,故遂孑然于学林之外”。^[37]其实,孤本未必都是准确无误的善本,通行本未必都是错误百出的劣本,关键在于底本和校勘质量。鲁迅先生多用通行本,由于他治学严谨,因而他的研究成果同样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。

参考文献

- 书信·致魏建功.见:鲁迅全集,第11卷,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1981:470
- 2,28 准风月谈·四库全书珍本.见:鲁迅全集,第5卷,266
- 古籍序跋集·《寰宇贞石图》整理后记.见:鲁迅全集,第10卷,46
- 4,5,25,27 且介亭杂文·病后杂谈之余.见:鲁迅全集,第6卷,182
- 且介亭杂文·病后杂谈.见:鲁迅全集,第6卷,162
- 书信·致许寿裳.见:鲁迅全集,第11卷,345
- 集外集拾遗补编·破《唐人说芸》.见:鲁迅全集,第8卷,106
- 集外集拾遗·北平笺谱序.见:鲁迅全集,第7卷,405
- 且介亭杂文·《木刻纪程》小引.见:鲁迅全集,第6卷,47
- 11,15 古籍序跋集·《嵇康集》考.见:鲁迅全集,第10卷,68,73
- 古籍序跋集·《嵇康集》序.见:鲁迅全集,第10卷,59
- 书信·致章廷谦.见:鲁迅全集,第11卷,473
- 而已集·读书杂谈.见:鲁迅全集,第3卷,441
- 日记·1912年9月8日.见:鲁迅全集,第14卷,17
- 17,18,19 华盖集续编·关于《三藏取经记》等.见:鲁迅全集,第3卷,385
- 且介亭杂文二集·题未定草.见:鲁迅全集,第6卷,421
- 集外集·选本.见:鲁迅全集,第7卷,135
- 书信·致王志之.见:鲁迅全集,第12卷,190
- 且介亭杂文二集·书的还魂和赶造.见:鲁迅全集,第6卷,230
- 书信·致孙用.见:鲁迅全集,第12卷,45
- 且介亭杂文·买《小学大全》记.见:鲁迅全集,第6卷,57
- 集外集拾遗补编·题《芥子园画谱》三集赠许广平.见:鲁迅全集,第8卷,379
- 华盖集·忽然想到.见:鲁迅全集,第3卷,14
- 31,32 书信·致郑振铎.见:鲁迅全集,第12卷,228,238
- 书信·致孟十还.见:鲁迅全集,第13卷,134
- 南腔北调集·“连环图画”辩护.见:鲁迅全集,第4卷,340
- 日记·1912年书帐.见:鲁迅全集,第14卷,38
- 古籍序跋集·《唐宋传奇集》序例.见:鲁迅全集,第10卷,140
- 书信·致台静农.见:鲁迅全集,第12卷,102

曹之 1968年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毕业,1982年该系硕士研究生毕业。现为武大图书情报学院副教授。已发文103篇,出版专著2种,主要论著有《中国古籍版本学》和《中国印刷术的起源》。通讯地址:武汉,邮编:430072。

(来稿时间:1994-04-19。编发者:刘喜申。)